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创人之一

周恩来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要贡献

● 刘春秀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反抗外敌入侵的完全胜利的战争。在这场全民族的反侵略战争中,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所起的中流砥柱作用。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早已载入史册。他不仅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且亲赴山西同阎锡山商定红军出师共同对日作战问题,并迅即对八路军三个师的活动区域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进行战略部署;他既关心新四军、华南东江纵队的组建、发展,又适时派遣彭雪枫赴豫东开创苏鲁皖边区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华中、华南的抗日局面;他通观全局洞察世界风云,及时向苏联通报法西斯德国将攻苏的情报。并预见太平洋战争爆发,提出反击和战胜日寇的策略方针,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重大贡献。周恩来深谋远虑、精辟睿智的军事理论和机智灵活的军事实践,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作出重要贡献,也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一、洛川会议后,周恩来赴山西同阎锡山等商定红军出师共同对日作战及平型关战役和忻口会战的作战计划等问题的同时,迅速对八路军三个师的活动区域和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进行战略部署。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卢沟

桥一带突袭中国驻军的“七七事变”发生后,在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关头,中共中央在通电全国,呼吁“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的同时,于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通过《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周恩来出席了洛川会议,提出对形势要有持久战的估计,要继续推动国民党抗战,要加强全国群众运动的发动。并认为关于红军的作战方针,“还是运动游击战好”。他主张“我们的地区,是布置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消灭敌人。”

(一)周恩来赴山西后,同阎锡山等商定红军入晋共同对日作战等问题的同时,迅速对八路军三个师的活动区域进行了战略部署,并取得平型关大捷的伟大胜利。

洛川会议后,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分和彭德怀、徐向前等,于9月3日晚赴山西太原。

周恩来到山西后,首先同阎锡山和第二战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傅作义就八路军入晋后的活动区域、指挥关系、作战原则及平型关、雁门关的防御等问题进行会商。由于当时日本侵略

军长驱直入,而国民党实行片面抗战、消极防御的方针,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晋北局势吃紧。周恩来在同急切地盼望八路军与之配合作战的阎锡山会谈中,即商定了八路军到山西后以太行山脉及太行山北端以阜平县为中心的周围十一个县为八路军活动地区,进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后来根据时局和敌情变化,周恩来按照毛泽东来电指示进行交涉后,将一一五师仍按原计划部署在涞源、灵丘、阜平一带。将一二〇师部署于以管涔山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他提议并经中共中央采纳后,一二九师“速开正太线南北地区,夺取先机,以武装民众、组织游击战争,并扩大自己,以后逐渐向西南太行山转移”。

与此同时,周恩来对由薄一波提议,经阎锡山委托,组建的以牺盟会为核心的、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组建和领导的革命军队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即山西新军的前身,也予以关心。周恩来勉励他们做好发动群众、武装群众的工作,担当起领导与组织山西民众抗日的责任,保卫山西、保卫华北。周恩来还和中共北方局副书记杨尚昆致电朱德、彭德怀等,要求凡在八路军驻地及其附近,如有决死队、教导团驻扎,不管他们有没有党的关系,都应该以积极精神争取和影响他们,同他们密切合作。“我们必须组织和这一左派力量”。

9月21日,周恩来和朱德同阎锡山研究平型关战役计划,并决定用运动战来配合阎所拟的平型关围歼日军的作战计划。第二天,八路军总部向一一五师下达侧击平型关的日军的作战命令。9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洛浦:根据日寇以主力猛攻保定,以一部袭击平型关等态势,部署“八路军主力在灵(指灵丘—作者注)、广(指广灵—作者注)以南待机。”9月25日,一一五师主力在平型关伏击日军坂垣师团,取得歼敌一千多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的胜利。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以来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人民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二)周恩来在仔细研究阎锡山制定的忻口会战的作战计划后,提出修改意见和八路军配

合作战的方略。忻口会战是在华北抗战中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协同抗敌的一次成功尝试。

平型关战役后,周恩来又多次与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商谈忻口会战的作战计划。周恩来针对阎锡山把作战地区划分为左、中、右三个地区,以主力用在正面防御的作战计划,在经过考察忻口地区的实际情况后提出:着重正面防堵,损失必大,建议在中路地区以少数钳制当面之敌,而以主力“诱敌到代县、忻口之线,求得侧面出击消灭敌人”;“右路地区部队”,“主力展向平型关、沙河镇、繁峙之线,行广泛的游击,并与朱、彭原定一支队向浑源县西南,面向雁门关方向游击”,以牵制敌军;“左地区贺(指贺龙—作者注)部除宋(宋时轮—作者注)支队外,应向宁武南北游击,以破坏和阻止敌军的前进计划”。次日,周恩来又同阎锡山商定:为了统一指挥部队,负责守卫石岭关和太原的预备军的各部队将领,右翼各军(包括国民党军队十个团)归朱德、彭德怀指挥,中路归卫立煌指挥,左路归杨爱源指挥。阎锡山、卫立煌、傅作义均赞同此方案,毛泽东也复电表示同意。阎锡山虽然同意改变作战计划,但他并没有完全按照周恩来的建议去做。尽管如此,在1937年10月13日至11月2日,历时二十一天的忻口战役中,中路指挥卫立煌指挥前线将士英勇奋战;八路军总部令一一五、一二〇、一二九师协同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既切断了日军通往张家口、北平的交通线,又于10月19日夜袭阳明堡机场,烧毁日机二十四架。此战役歼敌逾万,是华北抗战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协同抗敌的一次成功范例。

(三)周恩来对于游击战重要性的论述及其坚持广大发展游击战争之方针,既牵制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又和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对稳定全国战局、唤起国人对抗战的胜利信心,起了重要作用。

1937年11月1日,周恩来即按照毛泽东关于“整个华北的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将华北划分为绥西、绥察边、晋西北、晋南、冀察晋等九个战略区域,部署开展全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他还派邓小平以八路军政治部和动委会共同名义赴五台山



1937年12月,周恩来来到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代表中国共产党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参与领导中共长江局工作。这是抗战初期的周恩来。

动员同蒲路东、正太线北各县民众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并征得阎锡山同意,发枪四千支武装民众,发展抗日游击战争。

太原失守后,在华北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上的大规

模作战基本结束后,周恩来便将工作重心转入开展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抗日游击战争方面。他一面呼吁我军应该“收集武装散兵”,“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并训练干部,以坚持抗战”。一面于11月6日在临汾各界群众大会上,发表《目前抗战危机与坚持华北抗战的任务》的讲演,进一步强调发展华北游击战的意义。他说:“这个抗战的性质,在极困难的时候,将成为以游击战为主体,来坚持华北抗战。”他在分析了持久开展的游击战,对于影响和推动全国抗战的开展及同时也使着日本无法结束这场战争等方面的利害关系和影响后,指出:“因此这个游击战将有胜利的前途。他要在持久战中,壮大自己,武装人民,恢复许多城镇,破坏敌人交通,消灭部分敌人,最后得到了全国生力军的参加,可以转到胜利的反攻,收复失地,驱逐日寇帝国主义出中国!”

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提出,“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的战略建议。他说,敌已入包头,转瞬将达五原,西北门户洞开。欲保陕甘宁边区及争取西北蒙、回族,联系新疆、内蒙古,必须发展绥远游击战争。11月15日,在归绥失守,蒙骑随时可能突入伊盟进扰陕北之时,他再次致电

洛甫、毛泽东提出该建议。并提议组织一千多人的武装,配备一部份骑兵,由一大员率领去发展这一地区的游击战争,中共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派出骑兵团和蒙汉支队,前往三边以北开展工作。

周恩来对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更是功不可没。他对于以袭击为主要手段的具有高度的灵活性、主动性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组建、发展,不仅从理论上进行系统的论述,而且从实践中予以指导。他根据敌人现有的兵力,不论其在北方、在津浦、在东南,只能占领我国交通要道及重要城市,如其继续前进,其后方将愈加薄弱等情况,指出:“我们应该抓住敌人这一弱点,派遣某些得利部队,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作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首先以自立的原则,一直发展到脱离自己乡村城镇的武装队伍,去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惫、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我主力作战。”^①对于什么是游击战,周恩来曾进行了科学的定义和诠释。他说:“游击战不是正规战,并不负决战的任务。它是以两种方式形成,一是部队中派出的游击队,一是群众武装的队伍,在不固定的战线上,进行袭击、抗击、截击和破坏的战斗,以达到吸引、牵制、分散、迷惑、迟滞、扰乱、疲惫、削弱和打击敌人的目的。”“游击战术最妙的十六字诀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②随着时局的变化,周恩来强调“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有二:一个是建立游击根据地;一个是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③在已被占领区域发动游击战争,必须“要有坚强的领导;”“要有坚强的干部;”“要到处把民众组织起来;”“行动要采取秘密性质;”“要时时与敌人接触;”“在不断与敌人接触中,才能生长出新的力量。”^④1939年6月6日,周恩来又详细论述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几个认识问题,进而指出:凡是在敌后组织游击战争的部队创建根据地,“必须要认识人人不仅是游击战争的战士,而且要做到人人是政治工作人员,这样的游击战才能够发展;”“必须要坚持”和“要动员民众”,只有“靠群众的组织,靠群众的掩护”,才能“在群众中间创建游击根据地;”必须“要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战术”。鉴于有些游击战术已经超过十六字

诀的原则,他将游击战的战术原则补充为:“敌击我隐”,“敌分我扰”,“敌进我伏”,“敌围我散”必须“有新的技术标准。”“现在跟近代化的敌人作游击战,我们的本领要更强,技术要更多。否则就没有办法在敌后游击战中存在、发展。”^⑤

在周恩来的指导下,经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八路军总部的共同努力,党领导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人民军队,在华北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八路军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各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尤其是战斗在华北的八路军广泛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发动得以破袭敌人交通线为主要目标的“百团大战”,既粉碎了敌人的“扫荡”政策,牵制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又和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互相配合,对稳定全国战局,乃至唤起国人对抗战的胜利信心,均起了重大作用。

二、周恩来历经与蒋介石等进行五次谈判,终于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国共两党携手抗战,不仅使日本侵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而且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才是团结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

(一)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上,历经五次与蒋介石等进行谈判,终于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自此开始了全民抗战的新时期。

自1936年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即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在西安、杭州、庐山和南京与国民党谈判,以促成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局面。因为日本对中国觊觎已久,继“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之后,1935年日本侵略军又蚕食侵犯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妄图吞并中国。怎奈蒋介石百般设置障碍,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尤其是8月13日日本侵略军突然发动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国民党当局在其统治受到致命威胁时,迫于全民抗战的形势和急欲调红军开赴前线作战的需要,蒋介石不得不改弦更张,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久拖不决的国共谈判才急转直下地得以解决。8月18日,国共双方达成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国民党统治区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

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并于8月22日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发表。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讲话,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自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在抗战初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共两党携手抗战不仅谱写了团结协作抗敌御侮的英雄史诗,而且使日本侵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

在抗战初期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国民党曾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了平津、淞沪、忻口、徐州会战及保卫武汉等战役,并取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八路军不仅同国民党军共同进行了忻口会战,而且为酝酿台儿庄战役计划出谋划策,可以说忻口会战和台儿庄战役是国共两党所谱写的团结协作抗敌御侮的英雄史诗。周恩来在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促成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期间,也广泛与各界人士接触。由于他多次与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主战派、桂系的领袖之一、后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的白崇禧接触,致使白崇禧在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特意把周恩来和叶剑英请到他的寓所,请教对敌作战方针。周恩来根据日本侵略军在津浦铁路北段大举增兵,企图直下徐州打通南北战场的态势,建议:在津浦铁路南段,由李品仙、廖磊两个集团军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配合下,采取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运动于辽阔的淮河流域,使津浦铁路南段的日军时时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而在徐州以北,以主力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白崇禧对周恩来这个建议甚为赞赏。他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采纳了周恩来这个建议。^⑥后来,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派张爱萍以八路军代表的名义,去徐州见李宗仁,转告周恩来关于要李宗仁在济南以南、徐州以北抵抗日军,同日本侵略军打一仗的意见。李宗仁和白崇禧采纳周恩来的意见,终于在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促成歼敌万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及其他军用物资的台儿庄大

捷。这是继平型关大捷后，国共合作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它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坚定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

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再加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建立抗日的民主政权、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阻滞了日军的推进，使日本侵略军叫嚣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

(三)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地斗争，既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逐步壮大了自己。并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才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希望。

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共两党曾有一段时间比较融洽的合作关系。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路线，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中心武汉成立，在周恩来等领导下，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这期间，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在西安、兰州、武汉、重庆、桂林等地设立办事处。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也在武汉公开出版。周恩来还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共产党人还可以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参政会。同时，驻武汉的中国代表团，负责同国民党联系谈判，以推动国民党实行全面抗战。

但是，由于国共两党原本就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加之1938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和广州后，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亡我不死的总方针下调整侵华策略，将主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企图动摇我们的抗战意志。在日本的政治诱降和英、美等国的劝降下，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公开投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制定的“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针蛊惑下，陕西、

河北等地相继发生袭击、杀害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的反共磨擦事件。

针对国内时局的逆转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等倒行逆施，1939年1月担任在重庆成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和董必武等，遵照中共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的原则，始终把民族矛盾放在第一位，坚决揭露卖国汉奸汪精卫，谴责反共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一次次反共高潮，以斗争求团结，继续争取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合作，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牢牢掌握抗战的领导权。尤其是在皖南事变后那些极艰险的日子里，周恩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坚持战斗在雾都重庆，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对党对人民的一腔赤诚之心，本着“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的中国抗战的铁则，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活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艰难地维系着国共两党之间的联系和团结以推动国民党抗日。同时，周恩来等领导南方局在党的建设、文化宣传、群众工作、军事工作和情报工作，特别是争取和团结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民主人士、地方实力派、著名知识分子，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并广泛开展国际统一战线，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了解、同情和支持。

正是由于周恩来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国民党的妥协、分裂、倒退行为进行有理有节地斗争，既巩固并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逐步壮大了自己，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力量。

三、周恩来既关心新四军和东江纵队的组建、发展，又适时派遣彭雪枫赴豫东开创苏鲁皖边区根据地，迅速打开了华中、华南的抗日局面。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相互配合，不仅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使日本侵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持

新四军的成立、发展、壮大，蕴含着周恩来

的心血。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一面命令八路军迅速向华北敌后挺进,一面就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未包括琼崖游击队)为新四军,开赴华中敌后抗战事宜同国民党谈判。1937年8月,周恩来派人把自广州起义失败后流亡国外十年、失去党的关系的北伐名将叶挺请到上海,希望他出任新四军军长做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工作。9月28日,叶挺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后,即赴延安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商议改编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的具体事项。11月12日,叶挺由延安到武汉着手组建军部和改编部队。中共中央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同月,周恩来到达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后,即和董必武、项英、叶剑英、叶挺等商谈筹建新四军军部问题,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

新四军成立并集中在皖南岩寺后,本应趁日军只占领大江南北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尚未控制广大的农村之机,迅速派部队向敌后挺进,以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地的指示。但是由于项英对国民党第三战区存有某些幻想,又过高估计了敌情,犹豫不决,1938年4月28日,才派粟裕率先遣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先遣支队于6月17日取得伏击日敌的韦岗战斗的胜利。6月至7月,陈毅、张鼎丞率第一、二支队相继进入苏南敌后,创建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抗日根据地。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挺进苏南后,即进抵皖南抗日前线对敌作战。1939年1月,李先念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后组编为鄂豫独立游击支队,改编为鄂豫挺进纵队、新四军五师),汇聚武汉外围的抗日武装,执行中共中央赋予的挺进豫鄂边区,开创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初步打开了江南敌后的抗战局面。

但是新四军与八路军在华北、山东开创的局面相比,还是有较大的差距。加之因项英对叶挺很不尊重,致使叶挺感到难以工作,曾一度离开新四军。为此,周恩来在重庆曾耐心细致地做叶挺的工作,并受中共中央委托于1939年春到新四军军部的驻地安徽泾县云岭,处理上述两

个问题。周恩来来到云岭后,按照中共中央同意他提出的“叶回四军”,“工作关系必须改变”,建议“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上为政委”^⑧,及中央关于“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的复电精神,^⑨多次找项英谈心,要他搞好与叶挺的团结。同时,周恩来经过实地观察和调查了解新四军的工作、军训和生活情况,及其驻地一面临敌,三面受围的艰难处境后,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干部大会上讲话。他在分析了武汉失守后的形势和新四军的任务后,明确提出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⑩陈毅、粟裕等积极执行该方针,8月,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1940年7月率部挺进苏北,成立苏北指挥部。10月在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黄桥战役后,巩固发展了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战的新局面。

与此同时,为了使华北和华中敌后抗战区域相互连接,以阻止日本侵略军南进,1938年9月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电示中共河南省军事部部长兼河南确山县竹沟新四军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主任彭雪枫:“把你们工作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徐向前、陈再道)联系起来,对整个战局有重大意义。”^⑪9月29日,根据日军集中兵力逼近武汉的紧急情况,周恩来再电彭雪枫:“情势紧急,你宜速去豫东发展游击战争。”^⑫彭雪枫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于9月30日率部东征,不久与吴芝圃等部在杜岗会师,于淮阳首战告捷。此后彭雪枫灵活运用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率领这支铁流及其组建的令敌人闻风丧胆的骑兵团,回师睢县、杞县、太康一带,驰骋于江淮大地,创建了新四军第四师,完成了开创豫皖苏敌后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豫皖苏敌后根据地和新的四军五师的建立,既打通了华北和华中敌后之间的连接,也宛如一把利剑插入日本侵略者的胸膛。

周恩来对于华南抗日武装的成长、壮大,也极为关心。从1937年8月国共谈判达成改编红军在南方的游击队协议后,周恩来即通过中共中央请令闽西南方方(方思琼)迅速来南京。1938年10月12日,周恩来对日寇进攻华南的估计进

行分析后,提出“我之方针应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②8}的战略性建议。1942年在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周恩来于11月8日提醒东江游击队,“你们在任何时候都需准备好对付顽方及日寇两方面的可能进攻形势。”并“同意成立军政委员会,以林平为主任,指挥东江及中路两部游击队。”^{②9}1943年2月,在部队受到损失后,周恩来电示林平:“你们应加紧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缩小后方,充实战斗部队。最近受损失的都是非武装人员就是显明教训。”^{③0}1943年12月2日,战斗在广东东江地区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后,周恩来致电广东省临时工作委员会书记、广东军政委员会主任、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明确东江纵队的工作方针:“凡你们游击所及其周围地区,你们均可自派干部,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唯在敌顽易侵入区,必须布置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地方党割断关系。”^{③1}1944年在日寇内阁更迭,但对打通粤汉路仍势在必行之时,7月25日,周恩来指示林平转军政委员会与临委,“你处工作应一本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之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向北侵占之区,只要其有久占意图,即应有你处派出得力干部或武装小队至该区与当地党员取得联系,尽力来发展抗敌武装斗争。”^{③2}1944年10月26日,周恩来根据目前重心在桂,但西、北江已成为敌人进出之路,而西江、南路在目前最为空虚,敌占区亦较东江为广等情况,致电林平转军政委、临委:“如此估计不变,我广东游击战争应以向西发展为目的主要方向。同时联系南路,打通琼崖联络,应该成为目前重要任务之一。”^{③3}1945年3月6日,周恩来根据国民党为着准备配合盟军可能在华南的登陆,已将三、七、九战区放在顾祝同指挥下,成立东南行辕。因此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较为薄弱等情势,指示林平等:“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以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③4}同年6月16日,周恩来在获悉美国不在华南登陆,日寇似在缩短广西阵线,转向粤赣边扩大战场的情势后,电示广东区党委:“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

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华南战略根据地”,“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③5}东江纵队坚决执行上述方针,开创了华南抗战新局面,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在党中央、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相互配合,不仅“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③6},使日本侵略军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而且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支持。

四、周恩来洞察世界风云,不仅及时把获取的法西斯德国将攻苏的情报通报苏联;而且预见太平洋战争爆发,提出战胜日寇的策略方针;并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起草六道进军命令,为中国乃至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周恩来洞察欧战风云,密切关注苏联东欧局势。他在获悉6月2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后迅即报告中共中央通报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杰出贡献。

1939年9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周恩来一面提醒人们认清日寇变单纯军事进攻为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的两面政策,同时洞察世界风云,密切关注苏联东欧局势。1941年6月16日,周恩来从他领导下的从事国际情报工作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处获悉6月2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代号为“巴巴罗萨计划”后,综合各方面的情况,通过冷静分析,立即判断出这份情报的价值。并迅即电告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指出:“此种守势,是暂时的,蒋确有所待。第一、等六月下旬德攻苏(他甚至连日子都定了,是六月二十一日开始)。”^{③7}对此,党中央、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阅读来电后,在周恩来落款韵目代日处注明“六月十六日”,并立即通报苏联。当时苏联虽然也担心德国在西方得手之后将回师东进,但仍然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有幻想,甚至认为西方舆论指出的德军将转向东方的猜测是“挑拨苏德关系”。由于我党及时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加上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在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发动对苏联进攻之前的一周内,使得苏联红军争取时间,提早进入战备,避免了更惨重的损失。对此,苏方曾表

示对我中共中央谢意。同年7月24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电:“二十一日开战的预测,彼方甚为重视。现急于欲查明者为德军之主攻方向,请极力设法探查密告至盼。”^③

对于阎宝航等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特殊贡献,1995年11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俄罗斯驻华大使罗高寿受叶利钦总统委托曾代表前苏联政府,予以表彰。

2、周恩来通览世界全局分析时局,预见太平洋战争爆发,并提出战胜日寇的策略方针。中国的抗战及国际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使德、意、日陷于穷途末路。

苏德战争爆发后,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敏锐识别力的周恩来,从苏日虽缔结了中立协定,但日本连德国攻苏的消息事先都不知道这一点判断出:“现在日本正处在焦急彷徨等待之中”。事实果不出周恩来所料,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内阁争论激烈。随着近卫下台,东条英机上台,日本法西斯军人内阁之出现,周恩来敏锐地指出,“这次日本军人内阁的出现,是日寇大冒险行动的信号”^④“是太平洋新危机之到来。”^⑤并准确地判断出,日寇的最大冒险行动是向南。周恩来这一判断也被当时我有情报系统的分析所证实。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周恩来致电在香港工作的张友渔,提醒日美有开战可能,要他做好应变准备。果然,1941年12月7日,日本以海军的航空母舰舰载飞机和微型潜艇突袭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的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周恩来针对日寇“不管其是在积极准备北进,或者南进,或者南北并进,但其灭华方针决不会有任何变更”的侵略行径,一方面呼吁“转变这一局势的关键,是在太平洋沿岸反侵略国家的共同奋斗”,“全世界的正义人士,一切反侵略国家”,“更加联合行动起来”,“群起扑灭人类的公敌——东西法西斯。”^⑥一方面提出“久已成了东方反法西斯的先锋”的中国,现在“更应继续担任牵制日本的光荣任务”,“努力牵制敌人,使其陷于两面乃至多面作战的困难,以尽国际反法西斯侵略阵线的主员之一的责任”。^⑦并提出为要打倒敌人,“非集合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各抗日党派的才智,通力合作,不能达到。”“首先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加强国防建

设”,“加强政治民主化”,“团结起来打敌人”。^⑧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从“九一八”以来,就是世界侵略战争的戎首,现在又做了太平洋大战的罪魁的日寇,所发动的完全是侵略的非正义的战争,周恩来在精心部署有关人员组织大批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经过各种途径转移到安全地带的同时,于1941年12月14日,撰文《太平洋战争与世界战局》,通览世界战争全局,对太平洋战争的局势进行深刻分析和科学预见。并强调:“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它,才能制它最后的死命。”^⑨“全世界一切反侵略国家和民族团结起来,便是战胜德、日、意法西斯的政治保证。”^⑩“敌人一日不退出中国,我国不能止抗战之火。”^⑪

太平洋战争的整个发展过程,也正如周恩来所预料的那样一步步地展开的。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德、意法西斯穷兵黩武,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激起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切齿痛恨。为了维护世界和平,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国的代表,在华盛顿签署了《联合国共同宣言》(又称《二十六国宣言》)。宣言表示决心共同战败德、意、日法西斯侵略,不到侵略国无条件投降,决不和敌国单独议和。此宣言标志着国际反法西斯联盟正式形成。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预示着德、意、日法西斯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3、周恩来通过中共中央向苏联通报的“关东军”在东北的详细部防,及周恩来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起草的六道进军命令,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贡献。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军民,高举反法西斯的旗帜,在没有外来枪弹的补充、没有外来粮服的供给、没有外来医药器材的接济,全凭人民艰苦奋斗、浴血奋战和自力更生,渡过了艰难的1941、1942年,成了真正打击日寇的中坚力量。

为了“坚持抗战到底,不达到驱除日寇出境,决不罢休”的目的,1944年夏,周恩来指示阎宝航获取曾被日本法西斯捧为“皇军之花”的“关东军”,在我国东北中、苏边界上详细布防图,其中包括陆、空军的配置、要塞地点、布防计

划、兵种兵器、部队番号、人数及将领姓名等详细材料。苏联红军得到这些材料后,调兵遣将于1945年8月9日对日作战中,由于目标明确、掌握主动,所以势如破竹、出奇制胜,将关东军打得溃不成军,至8月底将部署在我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

8月9日,在苏联对日作战的同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向全中国人民下达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动员令。8月10日夜至11日,周恩来为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连续起草六道进军命令:“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⑩

在中、美、英、苏四国的强大攻势下,8月15日,日本广播了天皇亲自宣读的《终战诏书》,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东京湾的美国“密苏里”号战列舰上举行。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战争,充分展示了中国军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也展现了周恩来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刚强意志和不畏强暴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天,重温中共中央、周恩来对抗战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的伟大理论和实践贡献,更引起我们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创人之一周恩来的深切怀念。同时,我们也更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日本不能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过去那段给中国及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历史,同军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么日本重蹈覆辙的危险依然存在。对此,我们绝不可以掉以轻心。■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注释:

《周恩来年谱》—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86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3页。

周恩来、杨尚昆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并贺龙、关向应、甘泗淇报毛泽东的电报,1937年10月18日。

金冲及:《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66页。

《周恩来年谱》—八九八—一九四九(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2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4—86页。

金冲及:《周恩来传》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72页。

⑪《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0页。

⑫《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7页。

⑬《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⑭《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⑮《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7—233页。

⑯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6页。

⑰《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⑱《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74页。

⑲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并转新四军的电报,1939年1月10日。

⑳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38年8月4日。

㉑《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3页。

㉒《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5页。

㉓《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㉔《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0—411页。

㉕《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14页。

㉖《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

㉗《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37页。

㉘《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65页。

㉙《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6页。

㉚《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25页。

㉛《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6页。

㉜《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3页。

㉝《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

㉞《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1页。

㉟《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8页。

㊱《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

㊲《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页。

㊳《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5页。

㊴《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

㊵《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1页。

㊶《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6页。

㊷《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34页。